

送汤

■文/张明军

“行船走马三分命，大肚子女人命一分”，过去里下河农村妇女生养都是在家里，接生婆叫“姥娘”，几乎都是上了岁数的老嫗。汪曾祺先生小说《陈小手》中的主人公就是一个姥娘，只是他是个男人。在里下河农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男的做姥娘的。

生养孩子有一套严格的“规矩”，姥娘一到，立即到房里查看宫口，如果孩子快露顶了，她会吩咐主家马上烧一大锅开水，将她自己带来的唯一的工具——一把大号的剪刀反复烧煮，同时将毛巾、脚盆、细棉布、毛边纸等所需物品准备好。女人生孩子的房间窗户紧闭、密不透风，房间里除了产妇，就是姥娘和产妇的婆婆，后者是打下手的。孩子落地“哇”的一声新啼，不多会，婆婆会出来告诉家人是男是女。随后，一脸疲倦的姥娘在料理完大人和给新生儿“洗生”后才出房给家主道喜。第一个进去看孩子的必须是产妇的丈夫，这里有谁第一眼看孩子孩子就像谁的说法。不懂规矩心急的姑娘抢着进去看宝宝的，要被骂成“马叉丫头”。

如果是头胎或碰到“忤生”（即脚先出来倒着出生）的，姥娘往往会要求主家赶快再请一位

姥娘，一是给自己壮胆，二是便于商量。一个能接“忤生”儿的姥娘是很让人信赖的。也有产妇自己接生的，用牙齿咬断脐带，这个孩子的乳名多半就叫“咬脐”。“咬脐”的妈妈被说成是“傍婆娘”，这其中也有对她勇气的敬佩。接生的姥娘并没有报酬，最多也就是娃娃办满月酒的时候请吃一顿饭。

孩子出生后，产妇的丈夫要到妻子的娘家和亲朋好友处报喜：送鸡蛋。鸡蛋的数目都是奇数，最少的是三个，最多的是十三个，视主家与其亲密度而定。但如果收到七个或七个以上鸡蛋的，就必须备礼前往看望产妇，此谓之“送汤”。收到七个以下鸡蛋的是不必送汤的，只是图个欢喜账。

接到报喜的信息后，娘家人就要准备“汤篮子”了。一个“坐月子”的产妇要吃好多只鸡，但送汤并不要抓两只老母鸡去，这和城里送月子礼必须送老母鸡的做法不相同。

那时的“汤篮子”就四样东西：二斤红糖、二斤猪肉、二斤馓子和一定数量的黄烧饼。前三样的数量是相对固定的，但烧饼的数量要看送汤人家的家境。最少得三十六个，最多也不要超过

六十六个，图个六六大顺的吉兆。东西放在大号竹篮子里，猪肉上要用红纸条贴上，谓之“挂红”，也是图个“顺序”。产妇如果有几个兄弟，妯娌几个就要商量了，什么时候到油面店定烧饼、馓子，烧饼要定多少个。里下河人对数字是很敏感和讲究的，太少了拿不出手，她们得为小姑子争脸。太多了也不好，不但有打肿脸充胖子的嫌疑，还要防止被人误解为小姑子生养不顺利、身体难以调养复原。商量的结果多半是对应自己的家境数字往多再靠一点，每个兄弟家准备的数量一样多。

送汤是女人的事，妯娌几个梳洗打扮一番，穿上出门的新衣服。她们轮流挑着“汤篮子”，到了小姑的庄上，总不免有人问到谁家，更有妇女们会根据对“汤篮子”轻重的揣摩估算出多少个烧饼而议论一番。听到人家叽叽喳喳的赞叹声，妯娌几个充满了骄傲和自豪，走路更有精神了。

舅母们来送汤是大事，做婆婆的要亲自迎接。放下“汤篮子”，她们看望小姑子和小宝宝，婆婆则立即到灶房烧蛋茶。招待送汤的是泡一大碗烧饼馓子，里面加几个“蛋瘪子”。这些烧饼

馓子有的是婆家的，有的是从舅母们的“汤篮子”里现取的，均无大碍。

娘家人来送汤对产妇来说是极有面子的事，“汤篮子”越多越得意。每次有人到村子里来送汤，左邻右舍的妇女们会来围观，半大的孩子们也特别喜欢来看热闹。每到此时，做婆婆的也总会从“汤篮子”里拿出一些，给每个孩子一小把馓子或撒半个黄烧饼，嘴里还会不住地嘟哝：“舅母带得太多了，吃不掉呢”，一脸的喜色。

送汤一般不留宿，临行前，

嫂子们除了交代小姑子注意事项，还会特地和姑子的婆婆客气一番：自家的小姑有不到的地方请婆婆原谅，麻烦婆婆多费心照顾好大人小孩。这只是一种态度，是送汤的舅母们必须具备的应有之义。



插画/郑海仑

尘封天主街

■文/朱同

天主街长190米，是连结大西路与中华路及往昔江边码头的重要通道。

题目上“尘封”二字，其意有三：

一是指它附近大片拆迁空地的扬尘，弄得整条街灰蒙蒙脏兮兮的；

二是说老地名天主街被尘封了，1966年红卫兵“破四旧”将它改成人民街，后来竟成合法；

三是指它几乎被当代人遗忘的历史档案。

天主街最早叫天主巷，原本从西门大街拐向镇屏山附近的一所天主教堂，后被拉直通往大京口（这条通江河道上世纪30年代被填成中华路）。从19世纪中叶始，镇江老西门至英租界之间发展出一大片商业区，天主街从中扮演重要角色。迄今我市被授予的四家“中华老字号”，全数集中在天主街及周边：街中段的

宴春酒楼（1940年）、街口西侧的老存仁堂（1831年）、街口东侧的鼎大祥（1939年）和距其不过200米的恒顺酱醋厂（1840年）。街对面的亨得利（1915年），则是全国数十家亨得利钟表眼镜店的首家。

如果我们打开天主街尘封的历史档案，会发现更多的秘密：

第一，它是古城民营快递业的发源地，是近代镇江的信息中心。

早在19世纪60年代，天主街及毗邻的柴炭巷，集中了全城二三十家被称为“民信局”的私营邮送机构，受理信函、包裹和汇兑业务。1896年大清邮政在镇江开设，这些民信局仍发挥拾遗补缺功能，1905年镇江各民信局交寄信函量达81万余件，仅次于广州和上海。上海申报创办之初，即在此街设镇江发行所。从晚清至民国初，镇江人接收外界信息，诸如辛亥革命、五

四运动、五卅惨案等，主要通过天主街申报这一渠道获取并作出热烈响应。

第二，民国初设在天主街的“第一救火会”，是古城民间消防事业的样板。

冠名“第一”，并非它创办最早，而在于它的示范性质。陆小波先生亲任会长，商铺集资购置机器龙一台、人力龙两台及水车、铜帽、钩件等，并设火情瞭望台一座，救火会成员均由商家青年轮值，每次救火的唯一“报酬”，不过是去浴室免费洗把澡。为解决消防水源，1924年，还以天主街第一救火会的名义在江边龙窝（位置在今长江路28号江边水厂西侧）开建镇江人自己创办的首家自来水厂。这已不是个别人士的慈善行为，而是在当时社会条件下，政府不屑做或无力做的民生大事，通过社会自治模式由民间推动，值得今人珍视。

第三，天主街创建了餐饮业与演艺业互动的商业模式。

晚清同治年间即有“京江第一楼”入驻，其门联“酒后高歌，听一曲铁板铜琶唱大江东去；茶边话旧，看几番星轺露冕从淮海南来”，不仅至今被中华楹联爱好者津津乐道，也透露了酒楼茶社书场混合经营方式。民国初又有顺兴园、中华园等著名餐馆相继开设，稍后又被一枝春素菜馆、宴春酒楼、萧家饺面店取而代之。就在宴春大门正对的小天主街，坐落着京江大戏院（1952年改为解放剧场），京剧、扬剧、淮剧、越剧很多著名表演艺术家曾在这里竞相演出，这也是解放前后我市戏剧演出场次和观众最多的一家戏院。这种餐饮加演艺的商业模式，曾演绎了天主街的以往繁荣，如今又被镇江人成功移植到西津渡景区。

第四，天主街出了一位中国近代史上的大名人——马相伯。

他于1840年出生在这条街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家庭，12岁在大京口乘民船只身一人闯荡上海。他是复旦大学的创始人，并一度出任北京大学校长。九一八事变后，这位爱国老人奔走各地为抗日救国呐喊，深受各界民众敬仰爱戴。在他百岁生日，国民政府特发褒奖令，中共中央在贺电中赞扬他为“国家之光，人类之瑞”。如今他的塑像静静矗立在复旦校园……

尘封的天主街，时下只有老宴春的大红灯笼依旧张挂。但愿西津渡景区的东扩能使它涅槃重生！